



湖南 (1860—1916)
张朋园 著

现代化的 早期进展

海外名家名作

湖南现代化 (1860—1916) 的早期进展

张朋园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张朋园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2

(海外名家名作丛书)

ISBN 7-80665-185-3

I. 湖... II. 张... III. 地方史—湖南省—近代
IV. 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2940号

责任编辑 曾德明

封面设计 章小林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 (1860—1916)

张朋园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10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50千字 印数: 1—3,000

ISBN7-80665-185-3
G·279 定价: 2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砚瓦池正街47号 邮编: 410073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作者简介

张朋园先生1926年生于贵州贵阳，1949年去台湾，曾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历任中研院研究员，大学教授、所长、系主任等职。早年研究政治思想史，1970年代以后转向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著有专书七种，论文百余篇。其政治思想史研究享誉全球，现代化研究开创国内薪新典范。本书讨论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深入观察湖南地区的发展潜力。湖南为鱼米之乡，人民干劲十足，其早期现代化起于湖南新政，成就可观。

出版说明

岳麓版《海外名家名作》丛书,专收海外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本书原名《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专刊”名义印行。作者对湖南省 1860 至 1916 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理清了这一时期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发展的基本脉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湖南省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也具有参考意义。

作者身居海外多年,原书中有些观点或措辞有明显不符合大陆出版物相关规定或大陆读者阅读习惯之处,编辑加工时已作必要处理。书中引用的档案资料数据甚多,限于条件,未能一一查找核对,其中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及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岳麓书社
2002 年 11 月

大陆版印行序

1970年代,在台湾的一批历史学者组织了一个集体研究计划,定名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我参加了这个计划,而且是计划主持人之一。我们使用当时正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观念做为研究架构,分全国为十七个区域,分两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研究沿海沿江十个地区,第二阶段研究内陆七个地区。我虽然不是湖南人,却选定了湖南做为第一个阶段的研究范围,本书就是该一计划的研究成果。

现代化研究在西方已经过去了,今天流行的是“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如此说来,好像我们的研究已经过时了似的。其实不然,在西方固然已经少有谈现代化者,但在中国,由于我们是后进国家(latecomer),现代化观念仍然很有用处,尤其以之观察十九、二十世纪的变迁,再适当不过。

承蒙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的推荐及湖南学界的厚爱,将本书交由长沙岳麓书社三版印行,感到非常荣幸。书社要我写一个短序,我不拟重复区域研究计划的组成及推动,读者参看本书的《代序》便可得其梗概。在此我要谈谈个人研究湖南的由来及心得。我于战后(1946)随着学校自贵阳搬迁去上海,湖南是必经之地,第一站在芷江住了一些时日,湘潭又有几天逗留,在长沙住的最久,转到衡阳再作盘桓,一路所见风土人情,印象深刻,最后从茶陵入江西,告别了令人流连的中国鱼米之乡。三星期湖南之游,由

于我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谈不到什么认识,但有意无意之间,我将贵州与湖南比较,两个地区的民风都很强悍,但贵州的贫穷与落后,人民生活不如湖南远甚,令人叹息。湖南富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我的直觉,或许就是二十六七年后我在区域计划中担任湖南研究的伏线。

我的早年学术生涯,搞政治思想史,第一本书写“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有人看了书名,以为我搞错了,说梁启超是保皇党人,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我回答说:不会错。1895—1898 湖南新政时期,梁启超来到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他的传道授业就是以革命为宗旨。与梁氏共事的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这批湖南人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志士,他们与梁启超有志一同推动革新中华大业。这些湖南人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进一步了解湖南人是我研究湖南的直接动因。

研究湖南早期的现代化,首先问其发展潜力,其现代化是何时开始的?其次问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何?兹将个人的发现和认识约略归纳如下,算是一个提要。

(一)湖南有两大发展潜力:第一,十九世纪时,稻米年产量约为1亿8千万石,三分之一足够全省人民食用,三分之二作为经济作物出售,所得可以推动现代化建设;第二,湖南人性格坚强,干劲十足,一心追求成就感,是发展现代化的一个优越条件。

(二)湖南具有现代化的潜力,同时也有现代化的阻力。19世纪湖南的保守势力甚为顽固。1860年现代化已在沿海地区萌芽,渐有启动现象,但湖南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西洋事务进入省内,以致湖南的现代化比沿海地区延误了二十年。

(三)甲午战败对湖南人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们觉醒过来之后,推动湖南新政,要求全面改革,设南学会试行政治参与,设保卫局建立警政制度,开发地下资源以求形成资本,建立新式学堂以培

植人才。湖南新政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在立宪运动中的一些创意,亦多有值得称道之处。

(四)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湖南的经济和社会均已有所发展,但国势动荡,现代化进展缓慢。辛亥革命(1911)以后,军阀当道,呈现停滞状态,现代化的推展有待继续努力。

本书撰写期间,由于海峡两岸悬隔,著者未能亲自来湘查阅档案资料,加上个人的见识有限,错误在所不免,敢请湘学先进不吝指教。

张朋园 谨启

2001年7月30日于台湾南港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代序)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是一个集体计划,从区域研究着手,探讨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发展与变迁。研究的区域有:广东、闽浙台、上海、江苏、山东、直隶、东三省、湖北、湖南、四川等十个区域,由同好十人组合,为时三年完成。^①

有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循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区入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但区域性研究,材料浩繁,驾驭不易,非一二人之力可以见功,因此有集体研究的构想。区域性的集体研究,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最大的困难在于各人所受训练不同,重点不同,见解更难求同,乃至至于探讨的范围取舍不一,方向尤其不易一致。为了克服此一困难,或减少分歧,不得不事先拟定概念架构,大家共同遵行,逐步探讨。我们选择了“现代化”作为约定的概念。

“现代化”译自 Modernization 一词。时下之学者于现代化一词之使用,已是概念性的术语。自 1950 年代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至于心理学、人类学,无不广泛使用此一术语,有关著作甚多,盖为三十余年来学术界一大盛事。

① 本计划亦为一校际合作计划。参与同仁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现代化并无公认的定义,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看法不一,经济学家又复与政治社会学家相异;甚至于同行者亦各执一词,引起许多争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颇受社会学变迁理论的影响。社会学的变迁理论则以变数(variables)说最具威力。他们设定甲变数为旧社会——或称传统社会——的特征,乙变数为新社会——或称现代社会——的特征,从甲到乙便是现代化。较早是德国学者汤尼(Ferdinand Tönnies)提出 *gessellschaft* 与 *gemeinschaft* 的说法(英文译为 *community* 与 *society*),前者含有“自然意愿社会”的意义,后者为“理性意愿社会”的意义。所谓自然意愿社会,人自出生而依亲生活,结邻而居,活动的范围不出乡村或小镇,所讲求的是血缘与地缘的关系。由于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教育的推广,专业化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建立,各种制度的刷新,世俗化,工业化……就到了理性意愿的社会^①。汤尼的说法,隐含传统社会是自然的结合,现代社会是文明的结合。

汤尼的自然意愿与理性意愿两变数,似对韦柏(Max Weber)的 *vergesellschaftung* 与 *vergemeinschaftung* 说有所影响。韦柏的意思与汤尼是相近的,所不同的,韦柏将这种变迁看成了一个进程(*process*),由自然意愿到理性意愿是一定的动向。虽然韦柏说这只是一理想型态(*ideal type*),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划分的两极社会。但是由于此一理想型态的建造,“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观念便形成了。韦柏指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从个人权威到多数民主,是从农业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个进程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结果。何谓理性化?他说:第一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有制度则不因人而事,讲求官僚组织,讲求法律的秩

①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Charles P. Loomis) (N. Y., Harper & Row, 1957) p. 35, 76-77.

序;第二是效率的提高,效率的需要日渐重要,高于价值观及规范;第三是进步,走向知识专门,技术专门,职业专门;第四是不固执于传统,对传统采取批评的态度;第五,建立真理的标准^①。

汤尼与韦柏的对称变数说,很能给人一种清晰的印象,了解一个社会的变迁动向。其他的社会学家亦有类似的说法,提出了更多的变数观念。有人说社会的变迁是从“身份到契约”(status - contract)^②,有人说是从“族聚到城市”(folk - urban)^③,有人说是从“神圣到世俗”(sacred - secular)^④。到了功能学派大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与席尔士(Edward Shils)等人,集思广益,列出了五对变数,他们以这五对变数涵盖人的行为范围,也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方向。这五对变数是^⑤:生而有之~成就取之(ascriptio—achievement);感情的执着~感情的中立(affectivity—neutrality);小我的取向~大我的取向(self—orientation—collectivity—orientation);个别主义~全体主义(particularism—universalism);广泛主义~特殊主义(diffuseness—specificity)。

两极变数说并不是绝对的^⑥,史墨塞(Neil Smelser)因而有较严

①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 Y., The Free Press, 1966), p. 136 - 139.

② 此为 Henry Maine 说。原出 *Ancient Law* 一书,转见 David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 68.

③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④ Howard Becker 说,转见 Ely Chino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 Y., Doubleday, 1964), p. 81 - 86.

⑤ 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p. 76ff.

⑥ Miles Simpson, "Universalism vs Modernity: Parson's Societal Typolog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XVI, 3 - 4 (1975) p. 174 - 206.

密的说法。社会的发展:1. 在技术方面,从简单的传统,走向复杂的科学;2. 在农业方面,从维生的生产走向商业的生产;3. 在动力方面,从人畜气力的使用,走向机械动力的使用;4. 在生态方面,从乡村聚落,走向城市化;5. 在知识方面,从通才走向专才;6. 在角色方面,从单元的角色,走向多元的角色;7. 在分工方面,从无所不能,走向专精一门;8. 在结构方面,从拢统到分殊^①。

以上是社会学家的变数说,对现代化的定义是很有影响的。

政治学家亦以变数观念来讨论政治发展,他们的看法颇不一致。有的认为当以政治系统的发展和代议制度的建立为主,有的则以为政治功能的成长及互相依存最为重要。主张前一说者,强调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就是民主政治的成长和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普及。换言之,政治发展重视平等的原则,在代议制度下,必须人人有投票的权力^②。后者重视制度化的问题,认为趋向制度化就是政治发展,必须加强制度化才能健全政治体系^③。最近的趋势,两者都同样受到重视。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问题都很广泛,惟有经济学家认定“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为现代化的首要变数。他们之所以

① Neil Smelser,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8)

② 这一派的学者,当以阿蒙及维巴(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为代表,他们认为政治参与,为近代政治的主要趋势,人民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他们将人民程度分为三类。乡土观念的(parochial)、子民观念的(subject)、参与观念的(participant)。旧日的人只关心乡土的事务,能有国家观念者,亦不过是作个好的子民。只有参与者才积极的表示自己对国家社会的意见。(见两氏所著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5, p. 2, 16-26.)

③ 这一派的学者主张在安定中求发展,普遍参与并不一定得到安定。安定中的发展,当讲求制度化及组织。此一学派以 Samuel Huntington 为代表,(见其所著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强调工业化,实因提高经济生活为现代人所奋斗的主要目标,直到1973年能源危机尖锐化之前,经济学家无不重视生产指数的提高,确认此为经济发展的大前提^①。

以上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发展论,似乎都企图为现代化一词下定义,但我们所得的印象,只是一些变数说。究竟现代化当如何界定呢?社会学家李微(Marion Levy, Jr.)强调说:“现代化就是不再以人畜的气力为动力,人们所使用的工具亦有不断的更新和改进。”^②所谓非人畜气力的动力,指的是蒸汽和电力,日渐更新的工具是机器。历史学家布拉克(Cyril E. Black)则很扼要地说:“科学的革命,人的知识不断的增长,得以渐渐控制其环境,这就是现代化。”^③政治学家罗士图(Dankwart A. Rustow)的说法与布拉克甚为相近:“现代化所指,是人类密切的合作,扩大了对自然界的控制。”^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旧日的人,生活在缺少积极作为的社会中,对自然界的态度是消极而柔顺的,认为人不能胜天,当然不能控制自然。现代的人,相信其可以改变环境,也有改变环境的意志。

人类有改变环境的意志,近代以来,确实使环境大大的改变了,这是因为人类知识进步、工具进步的关系。由于环境的改善,人的健康增进了,寿命加长了,活动的空间放大了,职业流动频繁了,城市的现象比乡村的现象强烈了;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次

① Benjamin Higg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ipl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New York, Norton, 1968)

② Marion Levy, Jr., *Modern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p. 11.

③ 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p. 7. 郭正昭等译,《现代化的动力》(台北,1972年)页7。

④ Dankwart A. Rustow, *A World of Nations*. (Washington, 1967)p. 3.

级组织的增加,人的角色也复杂化了;在经济方面,过去的经济结构简单,活动有限,近代以来趋向繁密,资本额与劳动力,相对的增加了;由于工商业有快速的发展,农业变成了次要,经济的活动空间扩大了;从中央政府的层面来说,中央的权力加大了,全国性的市场、资本及全国性的经济制度也加强扩大了。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现象,亦未尝不可说也是现代化的范畴。

当然这些变迁是一步步迈进而来的,今日所见,颇有五光十色极其复杂之感,但现代化蜕变之初则是步步为营的。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进程(a grand process),这一个进程,至少包涵下述特性^①:

(1)现代化是革命性的进程:传统与现代性呈现了明显的对比,人的生活大大的改善了。布拉克说,从传统到现代,就是从非人的生活走到真人的生活^②。班德士(Reinhard Bendix)说:十八世纪以来的改变,可以比之一万年前人类从游牧进入农业定居,是一个空前的进程^③。

(2)现代化是复合性的进程:现代化不是单一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空间。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改变也包括在内。这一复合的进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分殊(differentiation)、世俗化(secularization)、媒介扩张(media expansion)、识字的普遍和教育水准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扩大。

(3)现代化是系统性的进程(system process):这是连环性的改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III. (April, 1971)p. 283-322.

② 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p. 7. 郭正昭等译,《现代化的动力》(台北,1972年)页2—5。

③ Reinhard Bendix,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X(April, 1967)p. 293-346.

变,甲因素变,乙因素随之而变,全体随之而变^①。

(4)现代化是全球性的进程:现代化于十五、十六世纪始于欧洲,今日已传布全球,成为全球性的变迁。

(5)现代化是长期性的进程:先进的国家经过数世纪的现代化而有所成,目前仍继续现代化的进程。后进的国家以先进国家为模范,力求有较快速的发展。

(6)现代化是进步性的进程:现代化可能造成一时的异状,转变初期可能感到传统受了伤害,十分痛苦,但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果实是有价值的,无论自文化或物质观点言之,其使人类走向福祉是无疑的。

以上是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看法,这一些观念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西方学者用现代化一词来形容近三百年的变迁,我们则用来指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转变。西方已经高度现代化了,我们则尚在现代化的初期。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门户洞开,现代化随之而来,帝国主义欺凌我们,现代化的思潮却逼使我们不得不变。所谓现代化的冲击,最大的震撼莫过于洋枪大炮铁甲船,胡林翼因见汽船溯江而上如骏马之奔驰平地,为之大惊不已。李鸿章叹中国之屈膝于洋枪大炮之前,谓为三千年之变局。因此而有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当时看到了现代化技术革新的层面。1860年内河航行开放之后,外国商人和西方传教士自由进出,内地亦渐次接触到了西方的事物。新式教育的兴起,西书的翻译,留学生的派遣,中国人接触欧美思想更为普遍。从思想层面的改变而有种种改革的要求,戊戌变法(1895—1898),立宪运动(1903—1911),辛亥革命(1894—1913),五四运动(1919—1921),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或要求制度的革新,或要求意

^①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1958)p. 438.

识形态的评估,中国现代化运动有了实质上的进展。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就是将这一些变迁与发展作为研究的范围。我们以 1860 年(咸丰十年)为本计划的起点,以 1916(民国五年)为结束。起点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总理衙门的设立,第二是天津条约的订定。设立总理衙门是中国对西方态度转变的有形分水岭。过去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是十分强烈的,对外国人一概以夷人或蛮子视之,此后,万国一律平等,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北京条约的订定,中国的内河航行自此对外开放。内河航行的开放,是中西接触的另一个新起点。过去中西的接触限于官方及通商口岸。此后,内地的人民,无论上层或下层,都有较为广泛的接触,现代化的空间日益扩大。

本计划结束于民国五年也有两个理由,第一,这是袁世凯死去的一年。袁氏之死,代表中国旧政治传统的结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制思想并未完全扫除,袁氏以强人当政,进而称帝,违反人民意愿,最后终于败亡,帝制观念自此难于死灰复燃。第二,民国国会的召开,各省议会的正式成立,中国人自清末以来所奋斗的政治参与得到实现。现代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为“参与的爆发”^①,中国在这一个潮流中亦不例外,亦可见中国政治现代化有了相当的进展。无论袁世凯以极权手段将国会予以解散,这一个潮流是无法阻止的。我们推行现代化的研究,虽然以地区发展为入手,自当与这一个起止相配合,我们在分别研究之后,必须作综合性的整体结论,与这一个起止也是环扣在一起的。

本计划首先要讨论区域性的发展潜力,也就是中国的发展潜力。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天然资源十分贫瘠,中国人的智慧愚劣不堪造就,则中国必无发展的可能,中国不能及早现代

^① Gabriel Almond and Sy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 2

化的原因,不问可知。如果中国的天然资源深具潜力,而中国人亦不乏创造的智慧,则中国不能及早现代化的原因便就复杂了。这是本计划架构的基本观点。我们要讨论什么因素有助于现代化的发展,什么因素构成了现代化的阻力。

其次是中国地区性发展迟速不同的原因。我们知道沿海沿江得风气之先,有较为快速的发展。但先得风气并不一定有预期的发展,关键尚在接受或拒绝现代化的态度。布拉克说现代化的阶段有四,其中前二者为“现代化的挑战及新领导阶层的强化”^①,中国受欧风美雨的袭击,是空前的挑战,无论沿海沿江或内陆地区,最先难免都不以抗拒的态度来应付。抗拒或接受的取舍,决定于社会的领导阶层。中国的社会领导者为士绅群,他们久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于西方文化不无怀疑之处,自不免采取拒绝的态度。但是西方文化的强劲来势,岂止是一阵风雨,简直无异于排山倒海的狂飙,如何能不受其影响!传教士无孔不入,洋货如水银泄地。中国人对于传教士固然没有好感,但“洋火”、“洋布”、“洋刀”何者不令人喜爱,这些洋东西使中国人对西洋事物的态度渐渐转变,蒸汽机、火车、电灯等的输入,开始了现代化的输入。这就是现代化的挑战,这一个转变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当从传教士与洋商洋货的进入说起。是不是士绅阶级率先转变?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照常理判断,两个不同背景的文化相遇时,往往是敌视的。然久而久之,总有一方让步,进而互相调和,引起蜕变。儒家文化是不是有弹性,各地区的士绅阶级的态度,可以回答这一个问题。布

① 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p.

7. 郭正昭等译,《现代化的动力》(台北,1972年)页68—75。